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 二 十 一 )

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确实，文革在中国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后果与文革研究的贫弱形成了惊人的对比。论历史震撼，文革足以与法国大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相比；然而，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的思考与研究，中国人却远远赶不上西方。西方研究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成果是如此丰富深入，以至于不仅当代社会及人文科学无不以之为基础，而且它们已成为西

方文明与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观中国，文革结束已足足二十年了，但有关文革研究的著述仍是寥寥可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文革似乎并非亟待分析和探讨的大事，而只不过是一场最好尽快忘却的恶梦而已。但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无论从对同时代的人的了解，还是从自己的思想经历来看，我认为如果说中国人忘记了文革，或者没有对文革刻骨铭心的反思，都是错误的。

三十年前，文革爆发时我正是文革发源地北京大学的低年级学生，曾亲眼目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外墙张贴。时至今日，只要一闭上眼睛，当年的惊涛骇浪就会澎湃脑际。文革改变了我和我这一代人的道路。正是由文革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迫使我们这一代人从对现实发问迅速转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发问。这一转向，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仍可以算是继续文革时期的思考。我相信，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

既然反思文革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向历史、社会和文化发问的起点，那么为什么文革研究成果却如此稀少呢？撇开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乃至禁止公开讨论文革这一外部原因不谈，只要立足于中国人思想和心灵演变的大趋势，就会显示文革反思的静默和研究的苍白，也许正表明文革对中国人的震撼是何等的强烈，以及它所引起的震荡又是如何广泛和深入。

#### ◇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重要转折点

在一百五十年来中国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文革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转折点。在此以前，虽然各代中国人的思想呈现不同面貌，但有一条将其贯穿起来的主线，这就是寻找足以对抗西方冲击的现代乌托邦社会。这种追求既是社会性的也是文化性和道德性的。它一方面代表中国人抛弃儒家传统之后追求和缔造新的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当代中国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新解释。

在本世纪上半叶，这种追求所释放的巨大社会动员力量，被誉为东方睡狮之惊醒。但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运动日益激进左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文革宣告了中国人对现代乌托邦追求的破产。它犹如惊天巨雷，击中并摧毁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所辛苦建立起来的新向往。其震撼力之巨大，终于导致了中国百年来主流思潮的大转向。从文革中期开始，中国人心灵之迷茫、怀疑和困惑，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我们甚至可以讲，文革所引发的深刻反省才是中国人心灵真正走向开放和现代性的起点。因此，文革研究成果贫乏并不表示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缺乏反思，而只是表明他们在目前被迫转向对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终极关怀等更深层文化预设的思考而已。

事实上，不正是对文革乌托邦的痛切反思，使得中共领导人毅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回到在五十、六十年代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上来吗？八十年代曾席卷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也可以说是由文革逼出来的历史发问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思想层面的表现。其实，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指向文革的后设层面而暂时忽略文革本身，也许并不是坏事：这种暂时的忽略甚至也许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思想学术界刚刚从心灵长期封闭的状态苏醒，急需经过广泛吸收外界和传统文化资源的阶段，从而获得深入反思所不可或缺的学术和思想基础。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之开放，引进外国学术之快之多，只有五四时期可比拟。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学术研究已开始摆脱浮躁而步向沉实。可以想象，随着八十年代启蒙运动和民间文化运动的深入，包括文革研究在内的学术工作将会出现繁荣局面，并结下丰硕成果。所以，真正值得担忧的，是1989年六四以后的政治高压造成的启蒙思潮中断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今天我们可以逐渐看到，强行打断一个民族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思考过程，会带来什么长远后果。

#### ◇ 反思文革不能离开的两个基点

今年是文革爆发三十年，相对于国内的鸦雀无声，海外有关文革的议论却是沸沸扬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那些试图赋予文革某种合理性甚至先进性的论调。其一，是在声称反抗所谓中共官方彻底否定文革的意识形态霸权这一点上，或大谈毛泽东的“大民主”和“造反有理”之形式合理，并宣称它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有效性及必要性；或否认文革对工农兵、甚至知识分子的浩劫，认为它仅是对走资派和特权分子的灾难。其二，是援用西方后现代理论来重构文革，忽略西方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从而营构文革现象的“后现代”特征。从积极意义上来看，这些论调显示出某种多元性和开放性。但不幸的是，它们大多以选择性记忆为基础，所以与大多数中国人所经历的文革事实和体验迥然相异。有人称这些论调是忽视整个民族的巨大苦难，不能说没有道理。本来，如果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能持续深入下去，那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文革研究自然是另一种状况，而以上观点的存在也就更为正常了。

经历过文革和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学人都会同意，任何简单否定或肯定文革的说法都不免流于肤浅。正如所有复杂而惊心动魄的历史运动一样，文革有其多面性，包括表面上似乎应该肯定的价值。但正是因为把那些看起来无可置疑的理想和价值推到极端，才产生了文革的邪恶和野蛮。因此，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大脉络来看，文革研究不能离开两个基本点，第一，不要忘记和忽略至今还没有说话的沉默的大多数；第二，它必须是中华民族历史反思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既然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已隐含着中国人对文革的反思与发问，那么，今天的文革研究自然应该是站在这个基础上对历史的再发问。我之所以强调文革研究应以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为基础，是因为这一思想运动包涵了以下三个方面因素：其一，是指由文革到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的连续性；其二，我们应当珍惜文革留给每个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反对任何形式的现代迷信，维护开放、多元、理性；第三，文革反思的深化有赖于广泛吸取西方思想和学术成果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因此，真正的文革研究，不但要有史实的整理考订，还应包含我们中国人以往所缺乏的抽象学理探讨。只有这样，才可以产生与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相称的思想果实，才可以为人类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与制度的进步积累财富。

#### ◇ 本论文集的三个特点

编这本论文集，对我来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十几年前的冬天，我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每天来回挤三小时公共汽车，从北京西郊赶往东城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那里收藏着丰富的文革原始资料。有感于抄写资料太慢，我提出复印的要求。那知，管理员请示上级之后，不但不准复印，还取消了我凭介绍信获得的阅读资格，研究也随之搁置。从1990年开始，我的主要工作是编《二十一世纪》杂志，但同时也一直留心国内外的文革研究。杂志现以出刊六年多，从1992年起开始零星发表文革研究文章，去年和今年又先后推出四个文革专辑。现在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集，终于编成了这本厚厚的文革研究专题论文集。为此，我要感谢《二十一世纪》的同事，特别是余国良先生、关小春和张素芬小姐。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这本文革论文集才有可能感在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出版。

这本论文集有三个特点。一是文革事实的再发现。强调事实的实证调查，代表历史记忆的恢复和发展理论基础的可能性。有的作者告诉我，一些外国学者几乎不敢相信1966年8月发生在中学的血腥暴力事件的真实性。其实，三十年是整一代人成长所需要的时间，不要说外国学者了，就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还有多少人能接触到文革真相？因此复原并再现文革事实，其价值不仅在于它的震撼性，而更在

于它本身就是文革研究的基础。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开放性。本书作者包罗海内外中国学者和日本、法国、美国学者，由于他们的地区、生活经验和学术领域不同，因此他们对文革的感受、观察和分析评论也各不相同，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多元的讨论。本书第三个明显特点是具有世界视野。文革发生在中国，但它同时也属于世界，甚至可以说文革是六十年代世界性激进思潮和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而这一点往往又被今日不少热衷于西方文化评论和前卫思想者所忽略。为了充分认识文革的发源地和中心——中国，我们需要从中国开始来探究文革的意义逻辑，但同时也要避免忽略其世界性的一面。

最后，我无意高估本书的整体研究水平，但作为至今仍少有的中文文革研究论文集，特别是包括了不少中国大陆学者在艰难条件下的研究成果，它是值得重视的。对这些学者为研究文革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所承受的压力，我感同身受，并且表示由衷的敬意。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革是一个尚未真正展开而又具有永恒魅力的研究领域。编这本书，既满足了我个人想研究文革的未了心愿，又寄托着我对未来的期望。我相信这本书对未来更深入、广泛的文革研究将会有所启迪和贡献。

1996年11月20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

~~~~~

【自由论坛】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编者按：本栏两篇观点相对立的文章，由于篇幅较长，本刊删去了所有注释。对原文也有所节略，因而章节编号有所变动。〕

##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

• 崔之元 •

### 一、导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在展开分析之前，我先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说明。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走上“安定团结”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的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难”的经历，冷静地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子，说明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在目前实属极其必要：

例1．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一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多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冯骥才笔下的活生生的故事，给王绍光的如下说法提供了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法，何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成分等），也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虽易引起广泛的情

感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的社会根源。对于文革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超出“伤痕文学”的视野。

例2．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青和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象“崩溃边缘”四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例3．中国大陆1994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1989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激起了公愤。”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求。

例4．中国1995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五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虽然顾准不幸于1974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文革的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加入这一集体的思索。我将依次论证三个观点：

（1）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

（2）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哈耶克等保守主义者虽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性，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不足为训。

（3）以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

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 二、文革理论解析：“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早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判却大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下面分几小节来展开论述。

### 1. 文革起因，不只是权力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是“大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同年，毛泽东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必认真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说，以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威，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诸“大民主”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 2.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削足适履

严格说来，“党内资产阶级”或“新阶级”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M. Djilas，或译德热拉斯—编注）都指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与中共传统的也相悖。当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总理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可见，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从马列正统和中共传统上看，都是“异端”。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最具异端色彩的文革理论。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本身并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党内走资派”形成了一个新官僚阶级，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在于他突破正统马列，断定不和“大民主”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方向。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有严重失误，其要害在于他还是未能充分摆脱马列教条的约束，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大民主”制度建设的“话语结构”。他的“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之说法，由于未与马列教条的“旧话结构”充分脱钩，常在实际运动中被误用，达到与毛泽东初衷相违的效果。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夺权力，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份。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流产了的“大民主”实验。为什么这一实验以悲剧而告终呢？这就不能不讨论毛泽东的文革论中“失”的一面。

### 3. 创新的障碍：旧“话语结构”

本来，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之类说法，在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中却没有合法地位；于是，“党内走资派”往往不得不被说成是社会上的资产、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样一来，真正的文革对象——党内官僚集团，常常可以用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的办法，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据王绍光的研究，文革的头50天内，各级领导往往把它当“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由此可见“旧话语结构”对文革误导之一斑。

美国学者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C. Kraus）颇有见地地指出，文革中的“资产阶级”一词可被用做三种指谓：第一，它可指解放前资产阶级残余；第二，它可指人的政治态度、行为或“阶级立场”；第三，也是最棘手的，它可指党内官僚集团。第三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文革对象。但是，由于毛泽东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

毛泽东未彻底超越马列正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文革理论过分依赖于“资产

阶级法权”的概念，以之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用“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批评当时“供给制”结束后的新工资制，而毛泽东亲自为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但是，单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来看“党内走资派”是很狭隘的。这种看法只注意了收入分配上的差别，而未注意更根本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只从分配着眼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向后看”的理论，它严重妨碍了文革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建设性创新，结果导致“破字当头，立却不在其中”。

总之，由于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未能彻底摆脱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论又妨碍正面的经济制度创新，“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并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及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

### 三、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构想：经济、政治“大民主”的制度化

毛泽东试图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论去克服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矛盾。他在文革中倡导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次大实践。尽管这次实践以悲剧告终了（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本身未彻底超越正统马列教条），但其经验教训却为我们建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经体制提供了丰厚的借鉴。本节将通过对毛泽东的“大民主”的辩证扬弃，构想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体制。

什么是“大民主”呢？应该说，这一概念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觉得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还不够，提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毛泽东本不同意。但他说：“有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对“大民主”就更是肯定了，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可见，“大民主”一词是毛泽东从民主党派人士那里借用来的。它不是指小型的单位座谈会，而是指整个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论本身有严重缺陷，故“大民主”在实践中被扭曲了，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为专制压抑的空气所弥漫。

今天，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反省为借鉴，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的“大民主”理论，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构想出如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前景。



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应使中国的选举比目前西方国家的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力避金钱和私人大资本对民主过程的干预。美国在1974年后，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经费由公共财政支出；1992年美国大选中限制个人捐款最高数额的呼声激烈。这些做法可供中国参考使用。巴西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投票的法律，也可供中国借鉴。

毛泽东本人之所以未把“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直接民主选举，是和民国初期的选举给他留下的坏印象有关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曹锟贿选的恶劣性。因此，毛泽东1967年2月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毛泽东未能认识到，选举并不必然是贿选。选举本身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古希腊城邦有选举，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了全国选举，但这时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后来，资产阶级的确用金钱破坏了选举的民主性。但这不等于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选举搞得真正具有民主性。连美国1974年选举法还规定个人捐款不得超过一千美元；中国若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大民主”选举，一定能比美国做得更好。

第二，现代科技已提供了比“大字报”更有效力的民主手段——电视。“电子民主”的出现，使政党在欧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下降。因为电视带来的信息的迅速和普及，使选民可以深入了解具体问题，而不必再靠候选人的政党身份去推测候选人的政策取向。18世纪以来，代议制民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非政党的个人化的候选人为特征，如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麦迪逊和杰佛逊均反对政党；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党政治；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候选人的政党身份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个人化”的候选人又正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必要再走政党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国的电视网络，直接进行“个人化”的选举。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如下两个因素：（一）它避免了以“反对党”为民主化第一步必然带来的现执政党的紧张冲突；（二）中国共产党1943年以来实现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加强了党的控制力，另一方又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溶为一体。这与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平行因而有更强的独立的本党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能允许“个人化”选举的实行，并推出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

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和“不稳定权”。毛泽东的大失误，是没有建立“不可侵犯权”，没有给予个人不受政府和其他个人与集团非法干预的制度化保障。实际上，只有有了“不可侵犯权”，个人才能更积极地投入毛泽东所喜欢的经常的大民主社会实验。与“不可侵犯权”相辅相成的是“不稳定权”，它的目的是保证任何个人或集体的特权不得长久控制社会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不稳定权”在目前美国宪法中的初步体现是所谓“平等的保护”，它使得当某些法律将某些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置于严重不利地位时，司法重审可以推翻现有法律，而司法重审往往是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这就使得“造反有理”得以制度化了，避免了盲目性。

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安格（Robert O. Unger）教授及其领导的“批判法运动”，一直致力于将“大民主”制度化的理论探讨。安格主张，西方法律目前的“权利”体系有一大弊病，即“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与不受限制私人财产权被混同在一起，都被称做“不可侵犯权”。在他的新型的制度化的“大民主”权利体中，包括四项权利。第一是“不可侵犯权”，包括“言论自由”、“政治参与权”等，但不包括绝对的、超乎民主之上的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是“市场权”，这与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各项分散经营决策权、承包权等相似；第三是“不稳定权”，这是“造反有理”的制度化，其存在的理由的任何组织一经建立都有僵化保守的自然倾向，必须不断受到挑战才能具有“开放性”；第四是“团结权”，这是对经典合同法中关于“相互预期”和“信任”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作者认为，安格教授受毛泽东思想启发而建立的四项权利体系理论，对于中国今后使“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化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原因有二：（1）西方目前主流产权理论强调产权功能在于稳定经济行为者的预期，但实际上，“经济民主”比产权在更深层次上稳定预期。例如，我国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一直是沿着产权思路改革的（即通过延长承包期，从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但近年来不少农村家庭自愿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以便务工。他的预期并未因此而不稳，因为村民委员会对务工、务农的协调安排，实际是以“经济民主”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了比土地承包期更深层次的稳定预期；（2）“财产权”其实并非一个权利，而是一束权利，如“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资产管理权”、“转让权”、“托管权”等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束权都正在被分解和被重组的过程中，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分解和重组更向“经济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国营企业在改革中与集体、乡镇企业合资联营（往往由后者出土地，前者出技术）的倾向，就是对原来的“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之一例。它比苏东的“私有化”浪潮更能促进“经济民主”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将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第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不错，毛泽东曾发动“批林批孔”。但正如尼采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猛烈批判，并不妨碍柏拉图、基督教和尼采今日均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经典一样；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壮大今日之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事实上，毛泽东本人的确身体力行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例如，他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曾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夫之、章太炎的有关论著。这当然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与柳宗元的看法完全相同，而只意味着历史经验对于今日创新可以有所启发。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据毛泽东多年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的可靠回忆，毛泽东十分欣赏六代禅宗大师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勇于创新，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与毛泽东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关系，颇有相通之处。本文作者认为，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应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业，不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直接划等号；前者远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从后者正确的部分涉取营养；但后者的错误决不应该使前者自缚手脚。否则，我们就是搞喧宾夺主，就要犯阻碍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严重错误。

总之，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为我们构想21世纪中国的蓝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如果21世纪的中国能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开放性制度”，那么，中国就真的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构，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 摘自《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七年第二期：文化大革命研究专辑

∞ ∞ ∞ ∞ ∞ ∞ ∞ ∞ ∞ ∞

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

自从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发生以来，毛泽东思想在西方通常被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进理想主义的代表。尤其是在文革发动后，不少西方学者和激进人士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和以“新阶级”的提法为代表的德热拉斯学说相提并论，而且认为“文化革命”便是毛泽东试图保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新的制度下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重要尝试。甚至西方比较中立的学者也往往倾向于高度评价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中理想主义的成份，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文革起源里政治权力斗争的背景以及文革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都或多或少地有一定了解。例如，费正清在一九九一年新出版的书中写道：文革“是毛试图使‘民主集中制’具有更多的民主、更少的集中成分的一种努力。”同样，中国学者在研究“文革”或是撰写文革历史时，也比较重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面。哲学家李泽厚的论断也许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人士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的看法。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提出：“毛泽东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毛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彩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的超越还不够彻底。”

然而，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坐标似乎并不贴切，尤其是在评价被公认为文革指导思想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思想时更是如此。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突破甚至违犯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从列宁开始以建立严密而有组织的政党来开创一套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论以来，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基本上并没有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相反，从列宁的国家和革命学说，到斯大林的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阐述，再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无不是违背正统马克思主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论述的结果。当西方人士提到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及其创新性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参照坐标其实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几十年里共产党在其掌权的各个国家中推行的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实践中形成的、并被苏联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武装力量加诸于各“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的成员们头上一套所谓标准的“社会主义”楷模。

斯大林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一方面在于国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控制，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在于将阶级斗争扩大化，通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对社会中的异议分子和党内权力斗争中的不同派系进行残酷的清洗甚至肉体上的消灭。在斯大林式的政权下，人民不仅没有得到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所预言的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生活资料的平等分配权，而且丧失了在现代民主和法制社会中具有的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和政治参与权利。全体人民都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和随意支配。大量党的干部和无辜的普通人民被政权指控为“敌人”而遭到监禁、流放、屠杀。这种党和国家对公民和社会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体制被西方学术界称作“党政合一”制度。因此，自苏共二十大以来直到今天，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在进行经济社会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真正需要突破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制度，是

这种制度对人民的剥夺和对社会的控制。是以，人们在评价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发生的思想和政治变革时，斯大林主义被作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坐标系。这样，在评价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时提出的问题便应该是：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在文革中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教条？所谓毛泽东的激进理想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斯大林主义向激进理想主义——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方向的改良或革新？

S c h r a m曾经将西方人眼中毛泽东思想中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理想主义特点总结为下面这几条：“反对官僚制度，改造人性，通过发动群众的广泛参与来建设新社会和发展经济。”的确，文革中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激进理想主义吸引了大批西方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和中国激进青年的是它这样的几个特点：1、毛泽东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理论，对官僚集团进行了不留情的批判并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官僚集团、全面地砸烂官僚机构；2、毛泽东号召在政治上实行“大民主”，鼓动群众自发成立组织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并由此推动社会政治的改革和革命；3、毛泽东提倡深入的社会改造，反对等级制度，推动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平等。本文通过事实证明与推理分析，将推翻上述说法并论证这样几个观点：

（一）毛泽东从来没有象托洛茨基或德热拉斯那样将共产党官僚集团看作是剥削压迫人民的新阶级。他有关“党内走资派”或者“党内资产阶级”的指控首先针对的是有自由化倾向或嫌疑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包括他的政敌以及党内对他有所不满的人。

（二）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倡的“大民主”是以政治上极度高压为前提的。在“大民主”之下，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正常法制荡然无存。任何被指控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心怀不满或进行破坏的人，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党外，都会遭到群众组织的无情打击。

（三）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方案是要从根本上剥夺人民在生活方式和工作上的选择权，用军事化的手段组织社会，将全体人民置于党政合一式的国家的全面支配之下。

因此，本文要与上述中西学者争论的要点在于：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尽管有着激进主义的外表，但在本质上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翻版，甚至可以说，是斯大林式政治、社会专制主义更为严厉的一种表现形式。

## 一、“党内走资派”理论与反对党内“自由化”

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是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核心之一，也在西方为他赢得了能够与托洛茨基和德热拉斯相提并论的资格。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按照苏联的模式发展出来的一套官僚体系以及官僚机构中的大批干部非常不满，文革的目标便是要砸烂这个官僚体制，将那些被毛泽东指控为“资产阶级”和“敌人”的官僚从权力机构中清洗出去。《红旗》和《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篇社论在发动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该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抗性的矛盾。”然而，什么样的干部才能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衡量“走资派”或“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这是将毛泽东的说法与托洛茨基和德热拉斯的理论区别开来的关键之处，也是体现出毛泽东的文革与斯大林的大清洗之间共同实质的地方。在他的“新阶级”学说中，德热拉斯指出，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控制支配生产资

料，逐渐演变出一种“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而官僚集团则演变成为剥削、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里面“新阶级”的定义的根据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它指的是掌握了生产资料并利用这一地位来实现对其他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的社会集团。斯大林尽管亲手在苏联建立了全面的官僚体系，但他对党内干部却并没有多少信任之情。相反，在斯大林眼中，许多干部都有“间谍”或“内奸”的嫌疑，数百万干部横遭无妄之灾。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中到一九三九年十八大时有四分之三不见了踪影，不是进了劳改营便是上了断头台。对这些人的指控，通常是“阶级异己分子”、“间谍”、“德国第五纵队”等等。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师承的是斯大林而非德热拉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可见，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同斯大林一样，着意于清除那些被怀疑为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人物。进一步总结文革的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说法以及在文革中处理“走资派”的方式出自他反对党内的“自由化”并铲除党内任何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干部的决心。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似性便更为明显。毛泽东认为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标准有下列几条：

首先，在文化上纵容、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干部均属“走资派”，并且是文革最先打击的目标。文革前夕，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阶层的统治下，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过一点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极为有限的。学者们和作家们可以相对比较自由地写作和讨论中国古代的历史，舞台上和电影院里也可以演出许多题材的戏剧和电影，诸如爱情和破案等娱乐性较强而政治性较轻的题材。以某些微妙的方式，学者和作家们也有办法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提出一些小小的批评。西方和苏联东欧在解冻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也相当大量地被引入中国，使社会的政治文化气氛得到一定程度的松动。毛泽东以其对这种文化自由——哪怕是极有限的自由——的抨击来开始了他对官僚阶层的全面清洗。在《五一六通知》中，他亲笔加入了这样一段指责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铲除这极为有限的文化自由，也就成了文革中政治清洗的第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一场政治运动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激进理想主义在文革中所追求的，正是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下，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首当其冲，成了文革最早的牺牲品。

其次，凡是提倡在“阶级斗争”上采取相对比较和缓政策的干部都有可能被指控为“走资派”。刘少奇作为“走资派”的最主要罪状之一，便是鼓吹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尽管刘本人极力否认这一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开始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后，鉴于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其引起的政治恐怖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相对缓和的政治气氛。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宣布：“今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毛泽东，象列宁、斯大林一样，认为阶级斗争应该不断地加强，阶级敌人的范围也应该不断地扩大。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斯大林一样，对“阶级敌人”的定义并非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亦即以经济地位为标准，而是以思想意识为根据。这样，打击对象就具有了几乎是无限的任意性。根据这一理论，他在一九五七年发动了“反右”运动，将至少五十四万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经过“反右”和“大跃进”，到了六十年代，尽管中国的政治高压已经达到了几乎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毛泽东依旧指责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在进行“阶级斗争”中不力，并断然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入了本来已经很长的“阶级敌人”的名单。文革中大量并非“走资派”的普通人民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并不是因为如崔之元说

的“由于毛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而是从根本上毛就没有给过任何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批评以存在的权利，并且在多年的政治实践中一直对所谓“阶级敌人”——特别是思想上的异议分子——进行了从不间断的政治迫害。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迫害在斯大林式政权下的合法性，毛泽东才着意要将他在政治上的对手打入“资产阶级”的范畴，并据此来对他们进行迫害。

再次，那些主张在经济上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更多地作出现实的而不是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经济计划的干部都有被指控为“走资派”的危险。一九五八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将斯大林模式中党政合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控制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数千万人民死亡的空前悲剧。在此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阶层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农村某种程度上允许了一定的市场化，亦即在农村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在毛去世后中共进行的经济改革中，正是这些农村政策构成了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并给中国农业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工业经济中，刘少奇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经济刺激手段，以代替令人厌倦的政治说教和强迫劳动。而毛泽东对此大加挞伐，将其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他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批判“物质刺激”，要求在国民经济中“政治挂帅”。这种理论发展到极端，便成了后来全国人民所普遍嘲笑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误国误民政策。从某种讽刺的意义上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倒的确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性、指令性经济形式的一种背叛。但是，斯大林式的计划性、指令性经济中的关键要素，也是如今各共产党或前共产党国家在改革中要极力对付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强行干预。在毛泽东式的经济政策下，这种全面的、任意的干预并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文革中，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强制性的却又往往是毫无计划的干预，造成的是中国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的极度贫困。

因此，在由毛泽东这套“党内走资派”理论所主导的清洗运动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往往是那些相对比较温和、比较具有人情味的干部，原因是这样的干部最容易被扣上上述罪名，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即使是群众借机会去打倒那些鱼肉人民的干部，能够冠冕堂皇地使用的，主要是由毛泽东规定好了的上述几项罪状。最终，毛泽东的文革与斯大林的大清洗尽管形式不同，在对共产党国家官僚体系所起的作用上却有相当一致之处：党内比较温和的干部被清洗得几乎是一干二净。苏联的官僚系统为秘密警察所控制，而六八年之后中国的行政体制则为军队所全面掌握。

## 二、“大民主”与“群众专政”

文革中的“大民主”主要表现在言论和结社两个方面人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在言论方面，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加上文革早期的“大串连”；在结社方面，有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这都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提倡、支持、鼓励。

在分析上述“大民主”内容之前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中，“人民”或“群众”的定义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所有在政治上被指控为“敌人”、被打入另册的人，便丧失了“人民”的资格，也随之丧失了所有“大民主”中的权利。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此写道：“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因此，一句“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就方便地剥夺了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者的一切公民权利。“大民主”于他们是没有份的。考虑到文革的打击面之广，政治上被列入“敌

人”的公民之多，所谓人民享受了“大民主”的说法已经是大大地打了折扣了。毛泽东历来爱说的一句话是：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在文革中鼓动的“大民主”同样有着明确的目的。一方面，人民需要通过“四大”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四大”是对“牛鬼蛇神”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尽管无论地位多高的干部都有可能遭到批判，但这种批判却必须严格地依据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因此，文革中虽然是大字报铺天盖地，人人都写，人人都贴，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比过去无论什么时候都更舆论一律。只要是对文革的历史稍微具备一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将这种以高度意识形态专制为前提并以强化这种专制为目的的“大民主”与现代法制意义上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混淆起来。

文革“大民主”中比较吸引人的特点是那段时间里人民获得的空前结社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这令许多局内局外人都相信文革的群众运动中的确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内容。勿容置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的结社权，也就是人们根据自身共同的利益、需要、或信仰而组成政治社会团体、以这样的团体为基础在政治行动中争取自身的各种权益，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之一。尤其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由民间非政府团体推动的各种社会运动——例如工会、妇女、和平、反核等——成为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中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比较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与上述社会运动，关键并不在于它们之间在组织方式上有多少相似性，而在于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是否能象民主制度下的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真正享有独立政治行动的权利，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意愿去推动运动的发展，是否能以常规或非常规的政治手段来争取自身的群体利益或为某种独立的（通常是为正统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信念而斗争。文革的历史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就目的来看，文革中绝大多数的群众组织都致力于捍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现存的政治体制。群众组织的成立起源于北京中学生高干子弟成立的“红卫兵”。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的目的，按照他们自己所说，是为了当“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当时的红卫兵誓词是这样的：“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在这以后纷纷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凡是能够在某种程度或某段时间里获得来自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无不宣称为了同样的目标而“战斗到底”。相形之下，凡是在文革中试图进行独立政治活动，或真正以反对政治迫害或争取自身利益为主要活动的组织，都会遭到来自于政府和其它群众组织的严厉打击。文革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一切不以“捍卫毛主席、党中央”为己任的组织都有被打为“右派”或“反革命”的可能，哪怕它们仅仅希望争取极其有限的合理权益。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于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后，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文革中，许多以争取自身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群众组织都遭到了取缔。事实上，对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公民进行政治迫害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同时也是它们政治生存的前提条件，无论这些组织属于哪一种派别。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以，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不仅规定了群众组织的政治目标，也规定了它们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一场“革命”中，官方意识形态极力鼓动群众组织用暴力手段去对付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是这样说的：“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在这样的鼓动下，文革中群众性的政治迫害日益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因此，文革中与“大民主”相辅相成的是“群众专政”。群众组织、群众运动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利用来作为政治迫害的工具，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被文革的“群众专政”推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遍及了社会的每个阶层、每个角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在文革中给予人民以结社权。一旦在他的政治目的达到后，人民这一虚幻的权利也立即被收回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刘少奇开除出党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建立以军队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全国的群众组织都在“大联合”的口号下被取消，文革合法群众组织的历史也打上了句号。

### 三、社会改造与准军事化

Lucian Pye就西方的文革研究曾经说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论：“如今回过头来重新评价文革，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尽量希望客观地看待历史，他们总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描述的影响。过去如此，现在也依旧如此。”这种情况恐怕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毛泽东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改造政策上。

经过六六年中到六八年底两年多全面的动荡之后，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在全国推行了一系列被成为是“新生事物”的社会改造政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生，学制改革，等等。这些社会试验从某个角度体现了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除了铲除政敌之外还具有宏大的社会目标，亦即按照他的理想来全面地改造中国社会。正如Pye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有多少证据表明中国人民吃足了这些“新生事物”的苦头，许多西方学者相信并同意中国政府说的，“那只不过是革命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经常被称作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社会发展方案集中体现在他著名的“五七指示”上。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描绘了他的社会改造的理想蓝图：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从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从表面上看，“五七指示”的精神似乎近似于马克思曾经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都能够“上午进行批判，下午去做工”，人人可以平等自由地选择从事多种职业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在政治理念上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五七指示”中首先反映出来的一点，是在毛泽东社会改造蓝图中不存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人民并没有被赋予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去从事——或者不从事——某些职业的权利，而是被要求去做一些与他们现在的职业并不一定相干、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愿意去做的事情，或是去从事一些他们并不一定喜欢、也并不一定愿意从事的职业。在实践中，这种要求变成了强迫。在六、七十年代中，人民的前途、命运、日常生活受到政治权力的随便摆布，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国家的任意干预，八亿人民的中国成了毛泽东个人随心所欲的社会试验场所。毛泽东的社会试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已经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说明毛泽东文革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共通之处。学者们在研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时早已发现，共产党政权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经常性地将社会保持在一种高度的全民政治动员的准军事性状态之中。这样的准军事状态有利于党政合一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使得国家能够随时大规模地调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去实现某种目标。在中国，自从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以来，政治动员程度日益升级。在“五七指示”中体现出来的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更是打算要将中国社会全面军事化，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统统纳入军事化范畴，用训练、管理军队的方式来训练全体人民，管理整个社会。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他自以为在将中国描绘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在他权力的巨掌下中国大地被刻凿得满目疮痍。

毛泽东那一套将社会军事化的做法，不仅斯大林的苏联推行过，希特勒的德国也推行过。历史学家BullOCK在比较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三十年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之后得出结论说：希特勒自视受命于天去将德国人民从战败的屈辱和魏玛共和国的堕落中解救出来，使德国人民在世界历史中重新获得高等民族的地位，并通过在东欧建立新的德意志帝国的途径来保障这一地位。斯大林认为自身的使命在于结束俄国数个世纪的落后状态，将一个农民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同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者的目标都需要通过人力物力上的牺牲才能达到。然而，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世界历史舞台是不计这些代价的。历史会为他们说话，会原谅他们，正如历史已经原谅过他们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成功。人们或许可以争辩说，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与手段与斯大林和希特勒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然而，在无视人民的痛苦和付出这点上，他们之间并无二致。多年以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分子与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往往毫不犹豫地将毛泽东推行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其道理也正在于此。

#### 四、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及其后果

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称作“伪激进主义”的根据在于，尽管毛的思想具有激进主义思潮通常具备的追求大规模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外表，但实质上，它所真正追求的是维护和加强斯大林式的党政合一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控制。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唯一错误，便是“阶级斗争”抓得还不够紧，“阶级敌人”消灭得还不够彻底。因此，他本人多次强调，文革的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中国走上斯大林去世之后的道路。因此，文革采取了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为的是要彻底将党内外“敌人”清除干净。无论文革中毛泽东导演了多少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活报剧，他始终围绕这个目标。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

毛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两方面严重的政治后果。

首先，“文革”在打击目标上的任意性和含混性使得“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尽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明确指为文革的主要目标，但到底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准？将一个干部定为“走资派”，既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又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组织程序，唯一需要的，是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肯。另外，“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也被包括在打击对象之中。但是既然打击标准是按照思想政治立场而不是经济地位来划线，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指控为“敌人”，因此公民也就在事实上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在文革群众组织的派性混战中，所有派别都以进行政治迫害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文革的打击面也就不可避免地无限扩大，以至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最终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

其次，这种意识形态使群众性暴力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合法化。既然“文革”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其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其斗争方式又是群众组织起来去自下而上寻找、打击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那么群众性暴力必然要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同样，上层政治斗争也必然要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成了政治斗争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工具。无论是想保护自己还是打击对手，利用、操纵群众运动都成了党内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文革就此陷入了政治迫害狂潮，而中国社会也因此被拖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灾难之中。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一些貌似激进理想主义的成份确实也曾经促使一些真正的造反派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有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试图从的阶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角度去理解“党内走资派”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应数湖南省无联极左派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该文将文革解释成为“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革命。结果是，凡公开提出这类理论的人无不遭到残酷镇压。

从六六年五月到六八年底两年多“文革”的结果，中国社会在六十年代末进入了军事管制下的高压状态。“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几次大规模的运动将文革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全面镇压了下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试验。七十年代末，当中共官方正式宣布取消这所有试验，并将六六至七六年这段期间称作“十年动乱，将这些试验称作“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政策时，人民中发自内心的拥护态度不仅十分明显，而且极为普遍。在中国的政治条件下，这恐怕已经是普通人民在最大限度上表达出来的对毛泽东伪激进主义的否定了。

□ 摘自《北京之春》四十二期 1996. 11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本期 校对：    | 钟 超（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读者技术咨询：   | 荣 刚（美国） |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cnd-help@cnd.org</a> >       |
| 网络技术维护：   | 何 为（美国） |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cnd-info@cnd.org</a> >       |
|           | 余子坚（美国） |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cnd-info@cnd.org</a> >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ord@cnd.org">cnd-cord@cnd.org</a> >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 <a href="mailto:cnd-manager@cnd.org">cnd-manager@cnd.org</a> >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 T P）：[ftp.cnd.org](ftp://ftp.cnd.org)[149.159.2.6]：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hxwz](ftp://ftp.canada.cnd.org/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